

# 分析全球经济危机的三个视角： 经济理论，世界格局，与危机对策<sup>1</sup>

陈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上海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中心高级研究员  
pchen@ccer.pku.edu.cn

讲话要点<sup>2</sup>

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崩溃，不仅来之于贪婪的驱使，而且归因于股票市场的错误理论。

建立一个新国际金融秩序的必要条件，在于主要经济体之间能否建立稳定的汇率体系，并协调他们的政策。

我从三个角度来讨论如何观察处理当前的经济危机：经济理论、世界秩序、和经济政策。

## (1) 经济危机对经济学理论的挑战和推进

在经济学理论当中，主流经济学对于经济危机的理论准备不足。假如我们想采用新的经济政策，我们就更需要经济学本身的新思维，因为糟糕的政策来源于

---

<sup>1</sup> 这是陈平在纽约国际高层研讨会“美国新政府面临的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和国际安全问题”上发言。会议举行于2008年11月14日，20国首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峰会的前夕。组织者美国《经济学家争取和平与安全组织》(EPS)，瑞士查尔斯-列奥伯德-梅耶基金会属下的《经济反思倡议会》(IRE)，和纽约巴德学院列维经济研究所，地点在纽约新学院大学斯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特邀讲演者依序为美国《经济学家争取和平与安全组织》主席，德克萨斯大学教授詹姆斯-加尔布雷斯；2001年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反思倡议会》会长皮尔-拉卡米；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赛鲁斯-安德鲁斯；决策经济学公司总裁与首席全球经济学家阿伦-赛奈；纽约新学院大学斯瓦茨经济政策分析中心主任特丽莎-基拉杜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佩里-梅林；加州大学河岸分校教授加里-蒂姆斯基；挑战杂志主编杰夫-马德里克；BLS投资公司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巴纳德-施瓦茨；金融犯罪法律专家，联合国与世界银行顾问杰克-布拉姆；密苏里-堪萨斯城大学犯罪防范研究所所长比尔-布莱克；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主编，詹姆士-美的森大学教授约翰-巴克利；后凯恩斯经济学杂志主编，田纳西大学教授保罗-理查森；英国剑桥大学皇后学院院长，英国工党经济顾问，约翰-伊特威尔勋爵；著名投资战略家莫斯勒；英国剑桥大学王后学院院长伊特维尔；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前巴西财政部长路易斯-卡洛斯-布雷塞-佩雷拉；前希腊外交部长，社会党国际主席乔治-帕潘德里欧等20人，被邀讲演的中国经济学家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陈平教授。会议文集由经济反思倡议会(IRE)在2009年3月，同时用英文和法文在法国巴黎出版，标题为：《寻找危机的应对方案：美国与新的世界金融体系》。陈平讲话在该书111-119页。注解为作者所加。

<sup>2</sup> 该要点为编者所加。

糟糕的理论。依我之见，有五个流行的理论可能误导我们的分析。

第一个理论是商业周期的外生论。代表者是经济学中的弗里希（Frisch）噪声驱动的商业周期模型<sup>3</sup>。外生论学派相信市场经济是内在稳定的；波动归因于外来冲击。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经济学界和媒体经常把美国的问题归罪于外国竞争者，淹没少数有识之士改革美国经济的呼吁。这次金融危机一个最好的教训是让人们认识到危机根源在系统内部。

我们早在 1988 年从美国货币指数中发现经济混沌时，就认识到经济周期是内生的<sup>4</sup>。我们用复杂科学的方法证明，外生学派诸如弗里希和弗里德曼（Friedman）都错了，内生学派如熊彼特（Schumpeter）和奥地利学派的海耶克（Hayek）是对的<sup>5</sup>。市场经济是内生不稳定的，要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必须有适当的不稳定性的管理机制。

目前最危险的是第二个理论：弗里德曼（Friedman）的外生货币理论夸大货币政策在处理金融危机上的作用，忽视货币政策受经济结构内在的约束，不仅理论过于简单，实践上会极端短视。弗里德曼假设货币的变动是外生的，中央银行的政策不受内在的制约，相信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即可防止大萧条，无视经济本身的结构问题<sup>6</sup>。弗里德曼在美国货币史中关于大萧条的货币主义理论并无坚实的证据和合理的逻辑<sup>7</sup>。现在的美国财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和许多国家的央行行长，似乎都受货币主义的影响，你们不久将会发现，货币政策对金融危机是治标不治本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中国在 1998 年出现了严重的通货紧缩，中国主要通过财政政策，大量投资基础设施，同时没有对货币贬值，不但成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也帮助东亚邻国走出危机。

第三个理论是卢卡斯（Lucas）的微观基础和理性预期理论，这是自由化运动反对凯恩斯革命的理论基础<sup>9</sup>。经济危机的根源究竟来自微观基础还是宏观或金融基础？一些人如巴菲特，把金融危机简单地归罪于华尔街的贪婪。我要问，为什么高盛和摩根-斯坦利这样的美国投资银行在中国的作用比他们在美国的作

---

<sup>3</sup> Frisch, R. "Propagation Problems and Impulse Problems in Dynamic Economics," in *Economic Essays in Honour of Gustav Cassel*, pp.171-206, George Allen & Unwin, London (1933).

<sup>4</sup> Chen, Ping. "Empirical and Theoretical Evidence of Economic Chaos", *System Dynamics Review*, Vol. 4, No. 1-2, 81-108 (1988).

<sup>5</sup> Chen, P. "Evolutionary Economic Dynamics: Persistent Business Cycles,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Kurt Dopfer 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apter 15, pp.472-5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sup>6</sup> Friedman, M. and A.J. Schwartz, *Mone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J: Princeton (1963).

<sup>7</sup> Temin, Peter. *Did Monetary Forces Cause the Great Depression?* Norton (1976).

<sup>8</sup> Temin, Peter. *Lessons from the Great Depression* (Lionel Robbins Lectures), MIT Press, MA: Cambridge (1991).

<sup>9</sup> Lucas, R. E. Jr. *Studies in Business-Cycle Theory*, Cambridge: MIT Press (1981).

为更具建设性？他们在中国也是赚钱而非作慈善事业。因为企业家并不是在政策真空中做决定，而是在一定的宏观环境中做决定。正是美国的宏观政策和金融解规鼓励了金融投机和垄断操纵，在中国就难有金融投机和垄断的空间。

卢卡斯宣称失业是工人家庭在工作和休闲之间的理性选择，政府干预的行动在理性预期下是无效的。他忽略了大数原理。我们在 2002 年就发现，商业周期的波动主要来自于金融中介和产业组织，不可能来源于工人和企业<sup>10</sup>。因为工人和小企业的数量比金融和产业集团的数量大得多。系统中组员的数量越大，他们独立波动的相互抵消就越彻底。因为宏观涨落的幅度与组员数的平方根成反比。所以数目少得多的大银行大企业，将产生比工人家庭和小企业大得多的宏观波动。

这次金融危机显然是由大金融机构的失败引起的。“太大不能失败”的信条是错误的。在处理大企业问题时有两种选择：让他们破产拆分以鼓励竞争，还是让别的大企业去兼并问题大企业，造成更高的垄断和集中。美国政府现在做的是后者，他们鼓励象花旗银行和美洲银行去接管脆弱的金融企业。中国在 80 年代改革问题国企时也犯过相似的错误，结果发现结果恶化，转而在 90 年代改变了政策，把有问题的垄断企业拆分。果然发现公司越大改革越难。中国的竞争力正是来自于开放竞争而不是垄断集中。

第四个理论是期权定价理论的布莱克-苏尔斯（Black-Scholes）模型。一些人把这次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瓦解归罪于“火箭科学家”。很少人能认识到问题出在期权定价的均衡理论本身。我们在 2005 年就发现，期权理论依据的几何布朗运动模型具有爆炸性的不稳定性<sup>11</sup>。当你不知道如何通过经验数据去校正衍生品模型的误差，盲目相信有效市场模型的均衡预言去操作，必然导致金融衍生市场的爆炸。正是主流经济学的均衡模型，完全忽略了由市场风潮引发的市场不稳定性<sup>12</sup>。

第五个是科斯（Coase）的交易费用理论提供了对于市场管制的更多的质疑，成为过去二十年市场自由化运动的理论基础。科斯认为金融市场是交易成本几乎为零的理想科斯世界<sup>13</sup>。政府或法律的规制只会增加交易成本。资源分配和初始的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没有关系。我们发现科斯理论否定了劳动分工发展过程中交

---

<sup>10</sup> Chen, P. “Microfoundations of 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 and the Laws of Probability Theory: the Principle of Large Numbers vs. Rational Expectations Arbitrage,”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49**, 327-344 (2002).

<sup>11</sup> Chen, P. “Evolutionary Economic Dynamics: Persistent Business Cycles, Disruptive Technology, and the Trade-Off between Stability and Complexity,” in Kurt Dopfer ed., *The Evolutionary Foundations of Economics*, Chapter 15, pp.472-50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2005).

<sup>12</sup> 曾伟，陈平，“波动率微笑、相对偏差和交易策略——基于非线性生灭过程的股票价格一般扩散模型”，*经济学（季刊）*，第 7 卷，第 4 期，2008 年 7 月，1415-1436 页

<sup>13</sup> Coase, Ronald H. “Payola in Radio and Television Broadcasting,”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2), 269-328 (1979); Coase, Ronald H. *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icago (1988).

易成本的复杂性，科斯理论和弗里希理论一样，是经济学中的永动机理论<sup>14</sup>。这次金融危机充分表现了金融解规的危险性和复杂性。

总之，这五种在主流经济学极有影响的理论，制造了一个自我稳定的市场幻觉，解除了政策制定者对经济危机的理论武装。

自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们就用复杂科学方法陆续质疑这几种以均衡理论为基础的经济理论，我们从实证、数学、和历史案例的多方面分析，证明他们的严重错误，我们不是仅仅作哲学批评。作为一个例子，我在这儿特别介绍前面提到的一个简单的数学关系——大数原理。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薛定谔——用它来解释宏观生物学结构稳定性的微观大数基础。可惜物理学家熟知的大数原理，象卢卡斯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家却不了解。

大数原理是说，对于一个有  $N$  个独立元素的系统来说，系统加总的波动幅度是  $\frac{1}{\sqrt{N}}$  的量级，换言之，微观构成的元素越多，宏观加总的涨落越小，因为微观

独立的涨落会相互抵消。

假如我们有 1000 家银行，让他们兼并为 10 家。你认为银行越大越稳定？微观上似乎有理，宏观政策结果相反：宏观加总的波动会放大十倍。美国最近 20 年的金融解规，先是促进了竞争，减小了宏观波动，然后放手鼓励兼并集中，正是超大银行的投机行为，拖垮了美国甚至全球的经济。

## (2) 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结构的演变

在讨论政策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从全球和历史的视角，观察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深层次因素。

我应该指出，虽然凯恩斯的财政政策在对付经济危机时可能比货币政策更为有力，但是短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并不能很快结束大萧条，因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全球经济结构的改变，动摇原有的全球金融秩序。

我以为麻省理工学院已故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Charles Kindleberger）关于大萧条的地理政治理论和目前的情况更为相关<sup>15</sup>。弗里德曼的货币史关于大萧条的理论是一个简单到难以置信的故事。他认为大萧条可以由扩张性的货币政策避免。美国之所以陷入大萧条，是由一个偶然事件触发，就是美联储纽约分行的行长，主张强有力货币政策的斯特朗（Strong）的死亡，导致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软弱无力。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史家特明（Peter Temin）用事实和计量经济学方法论的分析，否定了弗里德曼的理论。

金德尔伯指出世界性的大萧条是由大英帝国主导的全球化，由于英国一次大战后领导地位的衰落引起全球化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三个主要强国：

---

<sup>14</sup> Chen, P. "Complexity of Transaction Costs and Evolu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Kyoto Economic Review*, 76(2), 139—153 (2007); 陈平, "科斯谬想, 张五常猜测, 与交易成本的复杂性",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简报, 2008 年 17 期, 2008 年 4 月 19 日。

<sup>15</sup> Kindleberger, C. P.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Revised and enlarged edi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英国，美国和法国在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时，谁也不愿承担领导责任，反而在他们之间踢保护主义之球，转嫁危机，最终引起了全球系统的崩溃。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相似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危机。美国在二次大战后取代英国扮演全球化的领导角色，如今美国出了大问题，因为美国过多的军事扩张和过度的超前消费，削弱了美国的全球竞争地位，美元脆弱，动摇了美国在全球化中的领导地位。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秩序已经极大地改变了冷战时代的格局。如果美国、欧洲、中国这三大经济体不能协调他们的努力，我们可能会面临另一个全球的大萧条。我们必须面对的是：熊比特指出的创造性毁灭，将对当下的全球化产生怎样的影响？

有三个问题是和目前关于金融危机根源的争论密切相关。

第一、怎样看待美国的经济？你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封闭的系统还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人们常常以为只有小国才需要考虑外来竞争的挑战，似乎美国这样的大国可以关门决定自己的经济政策，而无需重视美国经济和全球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是非常危险的。早在肯尼迪和尼克松总统的时代，美国经济政策就必须考虑全球化的影响，更不用说今天了。

第二、目前金融危机的国际背景是什么？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金融的失衡不是根植于美国的过度消费，而是源于中国的过度储蓄。我的观察完全不同。世界市场上的定价权是不对称的。美国比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更加有金融市场的话语权，正是美国保护跨国公司垄断利益的政策，导致美国的产业外移和重塑国际劳动分工的秩序。

8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发动的自由化革命在经济政策方面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通过星球大战计划造成了巨大的军备扩张；另一方面他大幅削减税收和放松了金融的管制。由此引起的预算赤字是由大量的公共借贷来融资，造成高利率和强势美元，动摇了美国制造业的竞争力，迫使美国制造业外移到日本和东亚。然而美国不愿改变自己的全球战略，企图用迫使日元升值的办法来解决美国的贸易赤字。进一步迫使制造业从日本和亚洲小龙国家外移到中国大陆。现在美国正在尝试同样的事情去迫使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但是失败了。为什么？因为中国是一个有着巨大发展潜力的经济高度不平衡的大国。中国经济沿海过热可以移往内地，无需像日本和东亚小国那样移往外国。美国的中国的压力难以奏效，也救不了美国的结构性问题。

我观察到的“美国病”，根植于美国的金融资本主义取代了工业资本主义在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工业资本的行为是长期的，而金融资本是短期的。你不可能玩弄货币游戏来治疗美国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无论汇率如何波动，美国都有持续的贸易赤字，而德国和日本有持续的贸易盈余。美国的长期贸易逆差显然与汇率无关，而只跟美国的全球军事政策有关。美国有强大的技术和丰富的资源，但是美国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军事开支和金融投机。根治美国病需要改变美国的经济结构和全球战略。

目前争论很多的货币议题，我的观察是：中国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当中既承受了巨大的代价，又获得巨大的收益，就包括遏制中国的美国政策，在现实的地缘政治中，给中国带来的意外的好处。何以见得？

原因在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领导人真诚接受美国主流经济学家的建议让人

人民币的汇率钉住美元来保持经济的稳定。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和之中，美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一直在宣传美国在处理拉丁美洲国家汇率危机的经验，就是美元化，美元化，美元化!! 他们建议香港和中国的汇率应当以美元为政策制定的参照系。中国改革以前的经济学家和改革者并无市场经济的经验，只是从美国的教科书上学市场经济的理论，然后到实践中试验。他们相信美国教科书的理论，认为美国的国债相对股票和债券来说是无风险的。因此中国总理决定让人民币盯住美元，并允许国有银行购买美国的国债，以为那是国有资产保值的最好方法，银行也认为购买美国国债比借钱给中国自己的中小企业要好。美国的信用评级机构也把美国的国债列为最安全的投资，美国金融机构的债券等级也远远高于亚洲的企业债券。造成美国储蓄不足，反而国际融资的利率远低于中国这样的储蓄大国的利率的怪事。然而，一旦中国政府接受了美国经济学家的建议，美国债券就变成了中国政府的一个陷阱。由于美国不对称的市场开放政策，日本和欧洲在玩货币游戏方面比中国有更多的选择。如果货币升值，日本和欧洲可以买美国资产来补偿出口的损失，但是中国不能买美国资产，因为美国的安全政策凌驾于自由贸易政策之上。美国的银行和企业被中国的国有企业邀请成为战略投资者，但是中国企业接受美国企业的投资请求，却被视为对美国的安全威胁。中国用低利息借钱给美国政府，然后美国金融资本投资中国的战略企业获取高额回报，这看来是美国稳赚中国稳赔的游戏，究竟是谁占了便宜？结果是美国赚了短期的大钱，而中国赚了长期的人心。

在自由和对称的贸易条件下，中国将要从美国购买两类商品：农产品和高科技产品，中国对于美国技术的需求比粮食和牛肉大的多。然而，美国限制出口高科技商品给中国，却不限限制出口高科技产品给日本，其他东亚国家和台湾。迫使中国只能从这些国家获得二手技术。这给东亚国家创造了一个巨大的套利机会。自从 70 年代以来，中国对日本有持续的贸易赤字，对韩国，东南亚国家和台湾也是如此。中国对东亚贸易赤字的数量级接近中国对于美国的贸易盈余。显然，美国把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的市场转让给了东亚邻国与台湾。

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歧视政策造成怎样的地缘政治结果呢？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东南亚国家突然认识到中国在国际贸易中是比美国更可信赖的合作者。中国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没有让人民币贬值，而且东亚的经济从中国的快速增长中获益良多。中国冷战时代的对手变成中国亲密的经济伙伴，这一趋势扩展到中国的其他邻国，包括越南，蒙古，哈萨克斯坦，俄国，和印度，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圈，以人民币为中心，和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这同时也帮助了美元本身的稳定。如果美国认识到这是在亚洲和北美经济体之间的更密切的经济合作的基础，那么我们对全球化的未来可以乐观。如果美国的领导人把大中华经济圈视为一个挑战而不是一个机遇，那么全球化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里根革命意外塑造出的新的不平衡的地缘政治秩序，美国在日益增加的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下还能保持它的金融地位，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中国的汇率政策以美元作为标尺。到目前为止，中国和美国都对过去的合作感到满意，但是对未来充满忧虑。和东亚国家不同的是，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汇率稳定中获得巨大利益的美国舆论，不但不感谢中国，反而把美国的问题归罪于中国。这使在改革三十年中，一直虚心向美国学习的中国民众和领导人，近年来对美国的领导力产生日益增加的疑虑。美国的领导人应该想一想该如何赢得各国人民的信任，而不只是谋取短期的金融利益。

第三、怎么解释伯南克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疑团。

经济学上一个相关的问题是：目前美国主导的世界金融秩序中，为什么会出出现穷国补贴富国的怪事？难道穷国有能力制造阴谋用金融游戏来颠覆富国的财政？

我的观察是：这一怪像恰恰是跨国金融集团在全球扩张的结果。中国的高储蓄率是统治中国出口市场的跨国公司的逼出来的。中国超过一半的出口来自外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企业，大多数出口渠道被沃尔玛这样的美国跨国公司所控制的。中国公司在国际市场上没有定价权。中国在美国出售的产品，中国公司得到的回报仅仅是零售价的百分之二到五。中国加入 WTO 之后，中国市场比美国，日本和欧洲国家更加开放和竞争，因此中国企业的利润率远比发达国家的垄断企业为低。例如汽车市场，美国为三大汽车公司所统治，中国超过 100 家相互竞争的公司生产汽车。为了生存，中国企业不得不通过利润留成的方式，而非外部融资的方式来更新技术。这种导致中国民营企业的储蓄率远远高于发达国家。

换言之，中国的高储蓄率不能仅用中国家庭的储蓄率来解释。在中国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居民收入和消费的年增长率分别是 7% 和 6%。在中国的银行储蓄中，居民储蓄稳定在 50% 的水平上，企业储蓄超过 30%。和日本持续的低利率不同，中国国内市场的利率比美国国债高很多。中国中小企业和农民的贷款一直是中国政府的难题。沿海农业产业的灰色利率可能超过 30%-40%。不存在中国储蓄夺得自我不能吸收，才泛滥美国金融市场的问题。激烈的市场竞争导致技术投资的激烈竞争。中国政府控制投资过热时只有非常有限的手段，因为政府投资的比重远远小于民间的商业投资，地方政府比中央政府有更大的激励，为了增加就业和税收而鼓励制造业的发展。

可以想见，如果美国能够推动反托拉斯法，拆分象 AT&T 这样的垄断企业，美国工业将更加有竞争力。美国家庭假如像中国家庭那样，首先投资教育和技术更新，而不是投资大房子和汽车过度消费。美国自然在世界市场上更有竞争力，也才有更加平衡的贸易。

我以为伯南克的算术和理性都有问题。就算中国购买美国国债可以看做噪声驱动的一个源泉，它的冲击力能有多大呢？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大约为 \$7000 亿美元，美国的国债总额约为 \$9 万亿美元，中国持有的比例仅为 7%。国际外汇市场平均每天的交易量约为 \$3 万亿美元，大于中国全部的外汇储备。除非中国建立和美国一样的全球金融网络，并掌握储备货币和契约货币的金融强国地位，否则哪个理智的穷国不愿提高借给美国的利率，反倒自愿压低投资美国的回报？

伯南克认为，是中国的高储蓄率而不是美国的低储蓄率，导致美国的金融不稳定的。我的更为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是消费，还是新技术和新产业。美国教科书给出的美国政策是鼓励发达国家消费，购买新房、新车是观察经济的主要指标。你能给发展中国家同样的建议吗？我们讨论美国应该做什么时，必须考虑到国际竞争。假如两个竞争者，一个国家把大部分钱花在奢侈消费上，而另一国家化在投资创新上。你认为哪个国家将会赢得国际竞争？一个简单的常识问题，不是吗？你用不着宏大的理论就可以回答如此简单的常识问题。

### (3) 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问题

最后，我来讨论一下在当前金融和经济危机面临的一些政策议题。

我已经在美国生活了 28 年。我把自己看成美国和欧洲文明的学生。我从美

国人身上学到了很多。问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你们是否可以考虑，美国也能够从其他人，诸如欧洲人，日本人，或者中国人，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呢？基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我对美国的朋友有一些建议。

相互理解是在建立国际事务中建立互信的基础。以我的观察，中国人没有任何激励机制要去取代美国或欧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中国人的哲人说：“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中国人历史上在 7-8 世纪的唐朝和 15-16 世纪的明朝达到过世界领袖的地位，并为此付出很高的代价。中国人清楚的知道，大国兴衰是历史潮流决定的，不在人类意志的控制范围之内。

大家知道发展中国经济的困难远比美国为大，但是中国改革走出了新路。那么，我们大家能从中国的改革学到什么经验呢？

第一、我建议：发展第一，改革和再分配第二。如果经济处在萎缩的过程中，制度改革就几乎没有空间。很多人说我们应该增加养老金，拯救这拯救那。但是钱从哪儿来？你削减其他的醒目必然面对强大阻力。必须首先抓住增长的机会把饼做大，然后你才有资本使人相信，为了更好的未来可以作出点牺牲。投资基础设施和绿色科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可能是比大规模的破产、重组更有积极作用。

第二、美国可以把消费驱动的增长转变为出口导向的增长。美国出口什么？出口国债和通货膨胀对美国和世界都是不稳定的策略。你们可以出口通用汽车的全电气化的汽车。有些产品可能在美国卖并不好，但在中国和亚洲可能卖的好，因为他们的人口密度高，出行距离短。美国最有竞争力的行业是大学。很多中国家庭，包括贫穷的农民，如果有储蓄的话，他们都想将他们的孩子送到美国的大学接受教育。通过发展和中国的省或城市的合作关系，你们可能接收更多的中国学生。中国的地方政府和民间财团可能投资美国的教育系统和基础设施，来交换你们帮助中国发展更好的大学教育。

第三、交叉投资可以发展互信和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你可能会问：为什么美国需要中国的投资？中国曾经有过相似的疑问。从融资的角度来说，20 世纪 80 年代到 90 年代，中国的确需要外国的投资，但是 21 世纪并不需要，因为中国现在有巨大的国内储蓄。然而，中国仍然吸引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假如他们可以带来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和新的市场渠道。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为长期的直接投资者而设的，不是给短期的市场投机者开放的。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美国比中国拥有更多更好的科技，但很多大公司控制的专利和技术却很少被使用。中国许多企业希望进入美国市场，并非因为美国的利润率高于中国，而是想建立更好的商业形象。他们视美国为世界舞台。如果你能在美国的市场上站住脚，它标志着企业质量和形象的升级。如果美国对中国投资开放，将为现存的美国技术找到新的市场。在中国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中国政府的行为象政府保险机构，帮助外国直接投资降低在中国投资的初始风险。为了建立长期的合作关系和改变冷战的思维，假如美国与中国政府都能为相互投资提供保险机制，将对中美共同走出经济危机有巨大推动。

第四、竞争政策比金融兼并更加重要。几乎每一次美国危机，你总能观察到兼并和集中的倾向，这是目前金融危机的原因所在。例如，AIG 是最大的保险公司，它的问题产生宏观经济的连锁反应。援救 AIG 公司的代价高于拯救美国全国的医疗系统。我建议你们将有问题的垄断公司拆分成较小的企业相互竞争，才能分散风险和鼓励创新。如果你们让花旗银行收购美林，让美洲银行收购问题大银行，花期和美洲银行自己将面临更多的问题。这是我是从转型经济中学到的教

训：俄罗斯私有化没有拆分国有的巨型垄断企业，结果很糟；中国拆分了国有垄断企业，但是没有私有化，至今大有进步。竞争比私有化更为有效。

第五、浮动的汇率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实施以来，是全球化中内在不稳定性的主要来源。相对稳定的汇率对于有效的财政政策和国际劳动分工来说非常重要。美国、欧盟和亚洲国家不协调的货币政策的危险，可能引起一场竞相贬值的战争。它也许难以伤害外汇储备较多的东亚国家，但无疑将冲击没有足够外汇储备的国家，导致国际局势的动荡。未来的国际金融秩序只能通过主要国家之间的稳定的汇率政策实现，尤其是美国、欧盟、中国和日本，需要在他们的宏观政策和贸易政策之间形成紧密的协调。然后其他国家才能选择一篮子主要的货币，实现相对稳定的汇率。换句话说，一个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不再以单一货币—美元—为基础。只要三大金融实力—美国、欧洲和东亚—能够建立长期的互信，其中任何一方不在扮演自命的世界警察，或者自命的道德裁判，新的伙伴体系才可能建立。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对世界秩序有新的理解，才能够为可持续的全球化建立新的国际金融基础。否则，三个地区性的市场将会取代目前的世界市场，而边缘地区将出现不稳定的局面。

【注：感谢朱冬青同学的翻译，2009 年 4 月 2 日陈平对文字作了改正。】